

答還學文先生

• 劉青峰

拜讀還學文先生的文章後，發覺還先生對拙文〈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的意見基本上是由誤讀而來。我想，澄清誤讀，就可以回答還文所提出的問題。

對「官方意識形態」所指的誤讀

對我提出「科學主義」是當今思想自由化、衝擊官方意識形態的最大推動者，還文認為這是「事實的錯誤」。還文在列舉事實之前，先從邏輯上作出如下推論：既然十年改革中的科學主義「旨在並且事實上也是在豐富馬克思主義」，而「今日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那麼，科學主義「從根本上說來」就「不構成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衝擊，更談不上自由化」。

還先生的推理固然無懈可擊，但這種推理卻是建立在誤讀基礎上的，所謂誤讀即是將我所用的「官方意識形態」一詞轉換成「馬克思主義」。拙文中使用的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等概念，均有不同所指。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很快變為馬列主義意識形態。49年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是毛澤

東思想。拙文說70年代末期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是「文化革命中對毛澤東及其意識形態的神化」，它是一種「現代迷信」(第4期，頁32)，不是甚麼馬克思主義。而衝擊毛澤東思想這種官方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恰恰是「一開始它必然只能借助於原有意識形態結構中可供利用的部分」，即如我文章所說「70年代末科學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內部興起」(第4期，頁44)。

還先生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的，因為他在文章中多次引用我在分析第二次科學主義興起時所說，它「是與政治上『撥亂反正』相配合，其口號是回到馬克思那裏」(第4期，頁44)。所以，如果還文是要商榷70年代末科學主義是否衝擊了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那還有的可說。但還文所做的，卻是先行偷換了「官方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的內涵，然後進行推理，繼而用數千字來說明中國的科學主義屬於馬克思主義。這種作法就不是同我商榷了，因為拙文根本沒有說70年代末中國科學主義不屬於馬克思主義。

那麼，還先生是否在無的放矢呢？也許，還文的主旨並不是同我辯論中國第二次科學主義是否屬於馬克思主義，而是討論對它的評價。在這

還文先行偷換了「官方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的內涵，然後進行推理，繼而用數千字來說明中國的科學主義屬於馬克思主義。這種作法就不是商榷了，因為拙文根本沒有說70年代末中國科學主義不屬於馬克思主義。

一點上，還文在開篇引語和第一節，兩次說我的文章是為第二次科學主義評功擺好，旨在「揭示」(或「突出」)它「鼓吹自由主義、衝擊官方意識形態的歷史功績」。這裏又是一個誤讀。

對中國科學主義評價的誤讀

確實，我對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兩次興起所產生的歷史作用，作了正面肯定。拙文總結時說：「一百年來，每當官方意識形態陷於困境時(先是儒學，後是毛澤東思想)，科學主義都發揮了創造性地超越舊意識形態的功能」(第4期，頁46)。這裏我並沒有抑第一次而褒第二次科學主義的傾向。相反，因為第二次科學主義思潮正在繼續，對它作出最後評價為時尚早，所以我說「至今我們尚不能判斷第二次科學主義興起的後果」(第4期，頁46)。至於它是否會對中國回歸正統馬列主義、或締造新的意識形態牢籠起作用，我並沒有確定看法，也沒有提出意見。

但是，我對它的長遠影響是深懷憂慮的。正是出於這種憂慮，拙文在最後一段總結中強調，科學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瀰漫，「恰好反映了一百年來中國對科學本身和科學精神存在着不科學的認識」，「應該用真正的科學精神來克服科學主義中價值獨斷的弊害」(第4期，頁46)。

其實，百年來，中國人努力衝破一種意識形態牢籠卻又締造另一種意識形態牢籠的歷史，是令人深深感嘆的。我認為，研究當代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時，很有必要檢討那些長期潛在地制約中國人思想的傳統因素(包括思維模式)怎樣發揮作用，使得中國共產黨文化打上傳統印記，甚至

令其基本結構與傳統同構。幾年來，金觀濤和我沿着這一思路寫了幾篇文章，〈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不過是其中一篇而已。只要沒有偏見，即可以看到拙文在第一節末尾已點明了的主旨，即「對百年來中國科學主義和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關係作一初步的宏觀考察」(第4期，頁34)，並不像還文所說，拙文「旨在揭示第二次「科學主義」……的歷史功績」。

既然還先生對拙文主旨理解有誤，這就不單只引起誤讀拙文「官方意識形態」一詞之所指，因而在還文第一部分發了洋洋數千言對象不清的辯論，而且還會忽略拙文討論政治文化問題的角度，又在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三個概念與我討論。

關於「科學主義」、「唯物論」和「經驗論」三個基本概念

還文認為，拙文「科學主義首先是一種對科學的普遍推崇，而且它是基於對科學本質的誤解之上的」的說法，是「簡單化」，而我的說法「本身就是對唯科學主義的誤解」。遺憾的是，還文並沒有論證科學主義不是對科學的普遍推崇，不是對科學本質的誤解。我現在仍不明白，難道還先生認為，具有信仰色彩以及「價值一元論」意識的科學主義，不是對具有合理懷疑的、開放性的科學精神的誤解嗎？還文列舉了科學方法的基本特徵，這誠然不錯；同時，拙文提到科學主義概念時誠然也並沒有展開有關概念的全面討論，但文中已清楚說明，它的重心是文化問題，要討論的是中國「文化中科學主義思潮的產生和演變」(第4期，頁34)，那麼把讀者

可能已經熟悉的科學方法特徵複述一遍又有甚麼必要呢？

其次，還文說我「把唯物論與經驗論的區別說成是把科學當作知識還是當作方法的不同，在哲學上是不着邊際的」。我很奇怪，拙文分明是討論中國的唯物論科學主義和經驗論科學主義兩個流派以及它們的特點，指出「前者主要把科學理解為科學知識，後者則更強調方法」(頁39)。我並沒有把科學主義歸為一個認識論範疇的概念，也沒有單獨使用「唯物論」和「經驗論」這兩個概念，還文卻挑出這兩個概念，作出離題的曲解後，再指責我把這兩個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之區別，說成是「把科學當作知識還是當作方法的不同」。如果還先生不同意我對中國科學主義兩派特色的分析，那可以具體討論。但還先生在這方面不置一詞，反而抓住唯物論、經驗論，甚至樸素實在論的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之類概念，一路自己談將起來，是否有些對象不清呢？

最後，對我援引林毓生批評民初中國經驗論科學主義者的把科學誤解為歸納法的見解^①，還文最後一節認為和「歷史的真實」完全相反」。這裏，還文已挑起了另一場爭論，姑且可不論，我想說明的是，我同意林毓生的分析，而且對他就這種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很感興趣。林問道，為甚麼「這一考慮欠周的對科學的誤解，反被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們廣泛接受」？「為甚麼他們竟然一致認為在科學事業中歸納法具有優先性？」^②對這一問題，我認為「西方科學中那種對事實(主要是常識)的懷疑精神」，「中國經驗論科學主義者是十分陌生的」(第4期，頁40)。這也是為了說明在直觀常識理性思維模式制約下，中

國科學主義興起的原因及其特色的總論點。我以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例，指出其「恰恰忽視了如何判斷某項事實是否可靠這一關鍵環節」。本來，這不是一篇討論胡適的方法論的文章，但既然還先生說我對此不加分析，那我倒想引述一下胡適自己是怎麼看待科學方法的。胡適在他的《丁文江的傳記》中說，科學方法「就是赫胥黎說的人類的常識的推理方法，也可以說是『受約束的常識的推理方法』」^③。很清楚，胡適明明白白地將「常識」作為科學方法的重要出發點，不知胡適自己的說法，能不能代表「歷史的真實」？

還文一開頭就指拙文對第二次科學主義興起的看法「是事實的錯誤」，而他要從「歷史事實的角度提供一個說明」。不幸，「還文」首先誤解了我說的70年代末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把它說成是馬克思主義(而我認為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是毛澤東思想)；其最後一節又否認第一次科學主義的經驗論派側重於歸納法的特點，認為這與「歷史的真實」完全相反」，那論證也不能成立。我無法判斷還先生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掌握了多少「歷史的真實」，但尊重事實是起碼的科學態度，我希望還先生在與我商榷之前，最好先看明白拙文說的究竟是甚麼、又是怎樣說的。

註釋

①② 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含義〉，收入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該文提出丁文江、胡適等人認為「科學的特徵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運用歸納法」(頁307)，此外還有多處論述。頁321。

③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頁82。